

毛泽东诗词中的赤橙黄绿



诗词鉴赏

毛泽东诗词不仅情感真挚、思想深刻、气势磅礴、意境雄浑，而且颜色词的运用和搭配也个性鲜明，瑰丽神奇，达到了诗情画意的和谐共生，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政治色彩、时代色彩和民族色彩。

异彩纷呈

毛泽东诗词善于用不同色彩来体现内心感受，描绘自然景观，烘托社会实践。无论是单一色彩的强调，不同色彩的对比，还是多种颜色的调和，都把描绘恰到好处，增强了语言和形象的表现力，深刻揭示出描写对象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

毛泽东对色彩的感觉敏锐而又准确，既符合事物自身的自然属性，又契合人们的审美感知。“漫天皆白”“白云山头云欲立”“浪下三吴起白烟”“九嶷山上白云飞”“雪压冬云白絮飞”“白浪滔天”“白”分别指水雾、云雾、雪花，都有“白”的特性。“歌未竟，东方白”，“白”指亮如白昼，而“一唱雄鸡天下白”之“白”，包含浓郁的政治色彩，是对“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彻底改变，寓意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便有精生白骨堆”之“白”，则充满鄙视和憎恶。“黑手高悬霜

主鞭”“重庆有官皆墨吏”之“黑”与“墨”，指反动派政治手腕的凶残和卑劣。

毛泽东使用颜色词的方法灵活多样。有的直白，“索句渝洲叶正黄”，用黄叶指代秋天；有的含蓄，“延安无土不黄金”，用黄金寓意风清气正。有的诗句颜色词不露痕迹，但无“色”胜有“色”，如“雪花飞向钓鱼台”“鬃雪飞来成废料”，“雪花”即白色浪花，“鬃雪”即满头白发。“落花时节读华章”一句，说明时间是百花飘落的季节，但色彩斑斓却是其中应有之义。而在“漫江碧透”“橘子洲头”“暮色苍茫看劲松”“跃上葱龙四百旋”“古代曾云海绿”当中，对山光水色的描绘乍一看很单纯很清晰，可细一想却又很朦胧，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诗中有画

毛泽东诗词继承并扬弃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毛泽东写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里，一连三处提到“形象思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毛泽东诗词特别注重以形象反映现实，以形式表现内容，加上频繁使用色彩词或色感光感很强的词来烘托渲染，刻画出一幅

幅具体可感、光彩照人、栩栩如生的“图画”，诗画一体，相得益彰。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是一幅英勇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雪里行军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壮阔雄伟、浑厚悲壮的群山夕照图。“红军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是一幅温馨如意、秀色可餐的江南春景图。“红旗卷起农奴仇，黑手高悬霸主鞭”是一幅对比强烈、爱憎分明的斗争形势图。“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一幅朝气蓬勃、英气凛凛的巾帼英雄图。“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一幅花团锦簇、色调明快百花齐放图。“旖旎竹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是一幅亦真亦幻、协调悦目的湘妃传说图。

情有独钟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就审美体验而言，红色意味着热烈、兴奋、温暖、光明。红色是毛泽东气质和性格的底色，熔铸了他的欣赏偏好和审美理想，构成毛泽东诗词中所有色彩的主旋律，表达出鲜明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寄托。面对“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他的直觉首先捕捉到的是“赤”色。“残阳如血”“红妆”“红雨”“红霞”“朝晖”“曙光”等用语一再出现。

毛泽东构思色彩绚丽的画面时，往往以红色为主色调，他要么以多种色彩为陪衬，突出表现红色；要么以红色为

文坛名家

谈莫言近作艺术取向：另辟蹊径 力道依旧

自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各方都期盼莫言有新作问世。然而，他需要平静，需要思考和整理；读者也需要冷静，需要理性与平和。沉静数年，莫言终于不负众望，近两年来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杂志陆续发表10多篇作品，体裁包括短篇小说、诗歌和戏剧。探讨这些作品，不只是认识莫言新的写作成果，也是理解莫言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莫言获奖后的作品，以回忆往事为主，写法内敛含蓄，风格趋向写实，文字朴素节制。这与他过去长篇小說铺陈狂放、风格显然相去甚远。与他过去中篇小说的内里张狂也有所区分。2017年9月，莫言在《收获》《人民文学》分别发表《故乡人事》和《锦衣》。《故乡人事》系列由三篇短篇小说构成，重写往事记忆。莫言把自己定位为“说故事的人”，这三篇故事都是直击本事。《斗土》可以看到莫言一贯擅长表现的执拗人物性格、乡村邻里故事和邻里关系，自有一番风景。《左镰》是一篇力透纸背的小说，其力道是在不经意间现出来的。莫言的小说会绕着圈子讲，而后不经意间进入故事的核心。重现实主义的莫言秉持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记忆、笔法和风格，都在更加紧密地继承鲁迅的文脉。

《锦衣》是一部戏剧剧本，年代背景与《茶馆》相近或略晚。莫言在戏剧方面一直很有自信，他热爱戏剧，深谙中国民间戏曲的肌理，又兼得欧洲戏剧之精要，使得这部剧的戏剧性因素十分活跃。莫言在《锦衣》中并不刻意表现那个时代的矛盾冲突，他把戏剧拉回到生活，拉回到民间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故事悲喜交合，悲剧的大框架裹挟喜剧的戏剧关系，亦真亦幻，戏剧手法自由灵活，而且能做到自然而然，顺势而为，苦中作乐，趣味横生。

莫言的小说深得戏剧旨趣，不管是情节的关节处，还是场面、细节，经常发出表演性，有时夸张，有时荒诞，有时魔幻，使得人物、叙述和语言始终生机勃勃。戏剧性既是文学内在机制的活跃因素，也是文学把握生活丰富性和广阔性的外向视野。莫言的小说把民间戏曲视为艺术养料，形成内涵丰富而有张力的表现方法。《锦衣》这部作品，莫言则以小说笔法入戏剧，即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为推动力，由人物性格带动情节发展，显示出莫言把小说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杂糅交合的艺术才能。戏剧剧本《高粱酒》对原小说《高粱酒》做了较大改动，刘罗汉上升为主要人物，余占鳌更多了滑稽色彩，戏剧性和表演性因素十分充足，再次印证莫言戏剧天才。

近两年，莫言还发表《诗人金希普》《表弟宁晋叶》《等待摩西》《一斗烟笔记》《天下太平》等作品。这几篇各有其妙，每篇都有意想不到的独异之处，下笔又回到莫言自由放任的风格，小说有棱有角，有意有趣。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天下太平》，小奥手指被咬住引来路人想办法解救，如同一出戏剧，“小奥角色”手法可见莫言小说叙述的率性机智。莫言小说惯用小孩作为角色，洋溢着反常规验，思想藏于热闹非常之中。

莫言重现实文坛把几种文体都演绎一番，还有诗歌令人惊诧。《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雨中漫步的猛虎》等，写眼中所见，心中所想，貌似脱口而出，看似杂乱无序，却又妙语连珠。所谓诗性，或者诗句的关联逻辑，走的都是点石成金、随机应变的险棋。句子与句子之间不断变换、翻转，播放出幽默和意外的快乐。《七星曜我》组诗写他与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交往和友谊，写得真实、真挚。这几首诗或纪实，或抒情，或戏说，亦庄亦谐，自成一格，皆成妙趣，也属难得。

总之，莫言重现实文坛发表一系列作品，虽属简短之作，也篇篇可圈可点。把这些近作与过去作品进行对比，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作家不同时期会有不同作品，莫言换个写法也未尝不可。莫言近作与其说不露锋芒，不如说更加内敛节制，但力道还是在那里。过去他追求率性而为，汪洋恣肆，现在他回归故里，换一种方式写作。他早就练就了这一手。接下来，我们期待莫言更有思想力量和文学厚度的作品。

(源自《人民日报》)

射阳报的创刊与初期发展(下)

魅力射阳

选调人员 组织学习

在射阳历史上，1956年前没有办过县报，做专业新闻工作的人员也很少。办报，首先是要办报人。于是县委责成组织部、宣传部选调德才兼备又适合新闻工作的干部进报社。要求被抽调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后腿。为了加强领导，县委决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恒兼任总编；选调县教育局副局长严恒召和宣传部指导员孙中林任副总编；选调县委农林科科员王进任编辑，选调县委文化局陈晓津任记者兼摄影、美术工作，又调从部队转业地方的干部李培福通联工作。

抽调的几位办报人员过去没有办过报，学历最高的是两位师范生。为了掌握办报的基本功，学习外地办报经验。创刊前，经县委同意，由宣传部牵头，组织编辑部5人去南京《新华日报》、《江苏农民报》和《盐垦大众报》学习取经一个月，初步掌握了办报的基本常识和一系列程序，为《射阳报》顺利创办创造了条件。

1958年复刊扩大刊期后，除了几位创办人员外，又先后选调一批同志充实报社。他们是：李保仁、沈来宾、施以德先后担任副总编；沈维杨、张奇、孙超、沈健、吉萍、陈云山、杨蔚东、刘茂怀、林枫(女)、薛飞等同志分别任编辑、助理编辑和记者，又选调陈月清任会计、何兴霞(女)

任校对。同年4月23日，县委决定成立报社编委会，除总编、副总编外，王进、沈维杨二同志参加编委。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报纸创刊时，什么也没有，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没有办公地点，县委决定由县印刷厂提供三间草屋给报社编辑部办公用房与单身人员宿舍；没有桌凳，从县委机关抽出几张旧桌凳，一人一张桌子不够用，就两人合一张桌子办公；没有电动印刷设备，就用脚踏的四开机印报(因为印刷厂当时只有这一台方形机，其它都是人工操作的圆盘机)；没有电灯照明，就点煤油灯或蜡烛照明，开夜车的编辑、审稿、校对大样的同志两个鼻孔积满黑灰是常事；没有电讯设备，只有用收音机收录新华社电讯记录稿；记录的同志只有能一字一句记，一个标点一个标点记，从当晚10时开始要记到半夜，大半夜，有时通宵达旦；没有制版条件，报花、插图需制版的要送到盐城制作，印刷厂没有特号铅字，报上稍大的标题都是人工木刻，然后装在合字板上印刷；没有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跑，那时没有公交车，也没有专用车，从报社到印刷厂三里多路都是步行，就是到附近采访也步行，只有去远处采访才用上县委办公室给的一辆老掉牙的公用自行车。

在生活方面就更苦了，开夜车是常事，干到夜里12点钟只能吃二角钱、二两粮票一顿夜餐，几人合吃一碗蛋汤填填肚子。

建立通讯组织 依靠群众办报

《射阳报》从创刊起就贯彻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创刊号》上登了“以实际行动拥护射阳报创刊”的新闻，各地干部群来信来稿。如海湾乡(今新明镇渔湾村)五社社长张军等来信说：“我们射阳报创刊了，保证自己写稿也发动别人写稿，还发动大家订阅40份报纸，按生产队成立读报小组。”

创刊初期，编辑部收到通讯员来稿不多，常常是“等米下锅”。为此，县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通讯报道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建立健全通讯组织，向党报写稿，反映群众呼声。并对县委通讯站加强了领导，要求通讯站为上级党报组织稿件的同时，为射阳报组织稿件。各级党委均成立了通讯报道组，各公社的宣传委员、秘书、文书是当然的通讯报道员。

编辑部对通讯员来稿做到篇篇有登记，件件有着落。为了调动“大通讯员”的积极性，还开展了通讯工作竞赛，比谁写稿多、写稿好。按月按公社公布来稿用稿情况，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后，每日来稿量由几篇增加到几十篇。

县委重视关怀 依靠全党办报

县委对办好《射阳报》非常重视，从创刊到停刊、复刊，均是县委发出决定。在办报的过程中，不论在确定报道思想、报道内容，还是版面安排方面，县委都作过具体指示和核定。如对社论、讲话和涉及全县性的重要新闻，都由县委分管书记、值班常委审核，逐字逐句修改，在版面安排上绝对服务、服从于县委的中心工作。

为了坚持依靠全党办报的方针，县委除了下达文件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写稿外，还在县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把通讯工作作为重要议程，很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办负责人经常带头写稿。

在1956年5月创刊到1961年10月第二次停刊，共出刊1030期。《射阳报》办的总的说是好的，曾受到省报刊处通报表扬。但是，由于初办报纸，人才缺乏，办报条件差，在有些用稿质量、编排技术等方面仍不尽人意之处。(孙中林)



蜀山图

黄宾虹，原籍安徽省徽州(今黄山市)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成长于老家歙县潭渡村，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擅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其画风苍浑华滋，意境深邃。偶作花鸟草虫亦奇崛有致。曾在北京、杭州等地美术学院任教、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著有《黄山画家源流考》《虹庐画谈》《画法要旨》等。

名画欣赏

读吴冠中《墙上秋色》

本来只是一堵巨幅的山墙，在苏州留园。应该是先有了墙的空白，才引来藤萝的入侵。正因为有了藤萝的大举占领，才显出墙的巍峨挺拔。刚与柔，块与线，主体与陪衬，安详与躁动，相争而相生，对立而统一。吴冠中由是得到灵感，醉心要把对象纳入画面。但是墙体太局限——纵万里长城之长也永远有约束，如规定的舞台框死了生命的腾跃；同时天空也显逼窄，若突出广漠又势必削弱山墙的威严和藤萝的奔放。许多人一辈子就在这狭道中走马，磕磕撞撞，跌跌绊绊——内中也包括昨日的他。告别旧我，他尝试打破，折掉墙之界限，满眼就都是素景，舍去天空之割据，画幅就美不生动着云烟。紫藤、青藤于是大欢喜大解放，任它合纵连横，任它鬼隐蛇现。没有起始，也不见终极。没有指挥，也无所谓失控。率尔生长，恣意扩张。

吴冠中没有那种从小就得名师传授或仰承家教的幸运，像达·芬奇，像毕加索，像徐悲鸿……在他由初小而小而师范而工业学校而突然转向考入杭州艺专之前，除去贫苦的鞭笞和学业上的奋发，没听说他有过任何关于绘画的钻研，哪怕是像那个无师自通的王冕。这也好，置身局外并不等于两眼空空，得其自然，反倒具有了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正是凭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再加上另一股狂野——那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气质，促使他在走出艺专校门之后，又一个筋斗翻去巴黎美术学院。假如把中国传统笔墨比作他养他的大地，西洋绘画技巧则相当于他艺术生命的天空。整整三年，他在云端雕旋磨蹭，呼吸西方世界的八面来风。然而，美院毕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又断然返回中国，当你站得足够高，眼光又放得足够远，你就绝对能够理解：屈原早祀的是端午，而不是圣诞，耶稣能令教徒动容，却不能叫向日葵倾心。洋之须

眉不能长我之面目。他是大树，至少他渴望成为大树，东方的大树，他的根注定只能扎在母土。

你若想知道吴冠中归国后的历程，请阅读这幅《墙上秋色》。欢欣、热烈、挫折、失落，迂回、昂扬、缠绕、燃烧，心路曾烙印的，这纸上应有尽有。只要你懂得绘画语言，而且读得够耐心，够细致。从构图看，它有点类似作者的《流逝》。蒋捷有词曰：“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作者在一篇短文中诠释：“年光的流逝看不见，摸不着，只留下了枯藤残叶……”画家徘徊于时空的前庭后院，穿梭于记忆的左廊右虎，腕底是流而不畅的线，若断若续的点，闪烁明灭的形，寒碧葱郁之色……予人以一片苍茫悠远之情，感伤低徊之态。然而，从抒情风格看，它更像作者的另一幅《苏醒》。苏州郊外有司徒庙，庙内年汉柏四株，曾遭雷殛，僵而复挺，从断桩残株中再抽新枝，或作戟刺，或作虬曲，或如须髯临风，或如女萝附松。作者舍却老根主干，着力表现倒卧者的奋起，枯槁者的新生，画面粗线条扬，瘦线变柔，彩点、色块纷呈，谱奏生命的黄钟大吕。

这是一幅抽象画。它的造型，显然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启示，但它使用的材料——笔墨、颜料、纸张，却是东方的，尤其是它的意境，情调，神韵，绝对出自于怀素、于右任、八大山人后裔的魂魄。画家濡染的是“秋色”，但非关伤怀，更不涉悲怆，倒是近乎“丰收曲”、“欢乐舞”一类的交响。站在画前，心头会不期而然浮上这样一些诗句：“风翻翠浪催禾穗，秋放殷红著树梢。”“蔓藤行倦，野竹上牵牛。”“万里江山来醉眼，九秋天地入吟魂。”甚至联想到作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痴情，和“丹青不知老将至”的癫狂，联想到作者那本流传于世的散文集的题名：“画中心思”、“生命的风暴”和“沧桑入画”。所谓“线”，只是“魂”。道是散漫无序，却有根。道是形体错杂，却笔精墨妙，令人击节遐想。宛如传说中武林大师的绝世神功，纳大千于一粟，炼万形为春秋。作者写的是山墙秋色，刻划的却是人世春秋。

(卜毓方)



美文欣赏

(源自《中国文化报》)